

# 任继愈同志是如何指导研究生的

任继愈同志（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哲学史专业、宗教学专业博士指导教师，今年68岁。

任继愈同志自1978年以来共指导了19名硕士研究生和1名博士研究生。他希望宗教系每年都招收研究生三、五名，甚至更多些，不要间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达到。有的同志看他工作太忙，年事已高，视力又不好，培养的研究生本单位又不一定留得下，从心里希望他不要把自己的日程排得太紧。但任继愈同志常常说：“我们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要只考虑我们本单位”。每年招生季节，他都收到许多青年的来信。青年求知的欲望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我们党正领导人民进行“四化”建设，需要知识，需要人才。自己作为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去尽量满足这些青年的愿望，多为国家培养人才。所以他总是尽力争取多带几名研究生。

培养研究生，招生是第一步。业务有考核，政治审查也有专门部门去管。但针对宗教研究系的情况，任继愈同志提出，宗教研究系招的研究生，一定不能有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一定要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的考生写信来，讲述自己如何虔信宗教，愿意研究宗教。任继愈同志说，这些考生可以作其他适当工作，但不适宜作我院研究生院宗教研究系的研究生。

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课，任继愈同志就讲学风，讲做人。他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讲到我们应如何坚持马列主义。他指出，我们不能用经学的办法对待马列主义，而必须根据实践标准，通过逻辑分析，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不能只引用马列主义几个现成的结论加以简单对照就算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深入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简单对照的办法在国内不行，用这种办法来宣传马列主义在国际上也行不通，它只会降低马列主义的威信。他告诫研究生要有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待科学的严肃态度。他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些很受尊敬的学者讲了一些不该讲的、也可以不讲的话，这是很令人痛心的。这违背了科学的严肃性。有些人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印象不好，就是因为有些同志常常变来变去。这就妨碍对真理的宣传。为了宣传真理，我们必须随时修正错误，但不能随波逐流。”他要求研究生不是敷衍地、贴标签式地，而是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朮活动。他多次说过，我们要在自己的专门领域里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每个人都应为此而努力。

任继愈同志指导的1978级研究生分儒、佛、道三个专业方向，课程较多。任继愈同志本人就担负中国哲学史、佛教概论、道教概论、古汉语等门课程的讲授任务。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一周要讲三次课。有一次他患感冒，一边咳嗽，一边仍坚持讲课。他是宗教所所长、所外还有些兼职，既有繁重的行政工作、又有紧迫的科研任务，但他从不因此松懈自己作为指导教师的责任。

他带研究生，除了定期的辅导外，平素谁去找他，总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两位研究生写好了论文初稿，想请他审阅。任继愈同志让他们马上送来。见了面，这两位研究生看到任

继愈同志正患病卧床，他们很后悔不该今天来。即使别的同志指导的研究生有事找他，他也从不拒绝。研究生的论文，从选题目到观点，他都要和研究生反复讨论。他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尊重研究生的独立见解。有一篇论文的基本观点他不同意，和这个研究生讨论了多次。任继愈同志说，导师只能提出意见，论文还要你自己作。如果你认为自己确有根据，那就应该坚持。还有一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一些老前辈不同，这个研究生有点担心。任继愈同志鼓励这个研究生不必过虑，只要有科学根据，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任继愈同志对研究生严格要求，特别要求研究生认真读书。他说，不认真读书，出不了好成果。有一次他对一个研究生讲，听说有些研究生不大注意练基本功，这不好。他针对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安排研究生每月读一本书，从《论语》开始，到《墨子》、《孟子》、老、庄、荀、韩。读一本写一份读书报告，每一份报告任继愈同志都认真看过。他原计划让研究生毕业时每个注释一本书，既练了基本功，注释整理的古书如能出版，对社会也是个贡献。后来，由于统一要求论文，这个意见没有实行，但他要求学生加强基本功训练的思想并没有变。有几位研究生，在写论文的同时也各注释了一本小书，普遍感到受益不浅。任继愈同志反对繁锁考证，炫示博学。但他也反对离开材料，空发议论。他要求研究生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总体研究，又要求他们在作具体研究时要有整体观念，注意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他不鼓励学生用许多精力去写些功底不深的论文，他鼓励学生积累资料，打好基础。对于研究生们的作品，他从不过分赞扬。他说：“可以了”。这就是研究生能够得到的好评价。但研究生却从这里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护和帮助。他甚至象小学教师一样要求研究生字迹务必清楚。他说：“写稿人要为看稿人着想”。他不厌其烦地十遍八遍地为研究生改正那些写得不规范、不正确的字，并常常批上：“第三批简化字不要用”，“六不要写成大”，等等。至于标点的用法，改正符号和注释符号的写法和位置，他都谆谆告诫研究生注意。有一位研究生原来写的字迹不好辨认，在任继愈同志严格要求下，他象小学学生一样刻苦练字，终于达到字迹基本清楚、规范的要求了。这位研究生后来说：“我不仅练了字，也学到了严肃认真的学术作风”。

任继愈同志向研究生讲专业课，从不追求传授一套系统的知识，而主要是通过解剖一些具体事例向他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培养他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能抓住社会上、学术界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引导研究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比如，有一个时期，有一些人对孔子肯定过多，认为孔子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就这一问题专为研究生讲了一课。他分析了儒家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儒家的关系后指出：封建社会尊重孔子，根本原因是孔子支持封建宗教制度，并给予了理论的说明。他要求研究生要同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不能尊孔。还有人对唯心主义评价过高，任继愈同志也就此专讲了一课。他指出，唯心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发展道路上的必然阶段，从无哲学到有哲学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认识史上，唯心主义也是人类认识史不可避免的过程。理论上的错误也不等同于政治上的反动。历史上，唯心主义的某些命题也有积极作用。如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欢呼，这比老庄到王充听天由命，讲命定论要进步。但唯心主义多是提出问题，它对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则是错误的。唯物主义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在它的指导下，可以更有

效地推动生产的进步。唯物主义才代表了人类认识的正确方向和先进水平。最后他说，归根结底还是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他要求研究生一定要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

任继愈同志关心研究生的学业，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78级一位研究生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不理想，有些思想包袱，觉得自己不宜再作支部书记。任继愈了解这个情况后，专门找他谈话。任继愈同志说：“一个党员，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应努力为党工作，不能消极”。这位研究生在支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消极情绪，他说：“任先生那么忙，还专门找我谈思想，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他一直作了三年支部书记，直到毕业。还有一位研究生，毕业时分到某党校工作。行前对任继愈同志说：“到那里我还要坚持搞专业，公差太多总要考虑考虑”。任继愈同志：“那可不行。首先要作好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后来，这位研究生同同学们谈起这件事时说：“任先生不仅是我们的导师，还是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我一定做好工作，不能给先生抹黑”。一位研究生患眼疾，任继愈同志给他送来治眼疾的中药；一位研究生的爱人病了，任继愈同志给他送来药方；一位研究生亲属病故，任继愈同志把自己授课的酬金给他送来。还有一个研究生家里发生了不幸，任继愈同志到宿舍看望他，安慰他，鼓励他解除思想包袱，安心学习。任继愈同志经常到学生宿舍辅导学业，了解思想。他十分关心研究生的政治进步。班级党支部发展党员，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981年夏天，第一批研究生毕业了。由于住房困难，留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被安排在离市区较远的一些仓促修起的平房中，不少人不愿去。任继愈同志在茶话会上说：我们经常讲，要体谅国家的困难。现在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大家都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他们还谈到自己在北京大学时住房条件也不好，写文章时，常常把床板当桌子用，旁边还烤着小孩的尿布。他也讲到老的莫斯科大学房子紧张，不少人就在走廊上摆一张桌工作，很多优秀的学朮著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来的。最后他说：“困难只能影响我们的速度，不能影响我们的质量”。他还要求大家要谦虚谨慎。他发现有的研究生学习较好，产生一种优越感，就对他们说，研究生毕业，在科学的道路上仅仅是开始。要尊重别人，不要常常议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研究生不是一张白纸。各个情况如何，决定于许多因素，不少问题不是导师所能左右得了的。但导师有直接的责任和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导师本人的表现，更是个无形的教育。任继愈同志党性强，学风正，严于律己，不慕名利，生活俭朴，对人诚恳。他的稿费基本没有要过，成百元成千元地捐献给了国家。但他自己却为国家节省着每一分钱。他把底稿写在废稿纸、废信纸的背面，他在内部来往中用的都是旧信封。参加学朮会议，他宁可自己提着几十斤重的材料回来，也不到邮局去寄。在已毕业的两批二十多名研究生中，不论他们的导师是谁，不论本人情况如何，对任继愈同志都怀着由衷的尊敬。现在，他年近古稀，他还希望拿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希望带出更多的研究生。他对党、对人民、对青年有一颗赤诚的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世界宗教研究系